

# 古罗马社会的女性、身体与政治

——以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为中心

于艳平<sup>1</sup>, 李伟昉<sup>2</sup>

(1. 郑州大学 英美文学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1;  
2. 河南大学 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莎士比亚罗马历史剧《科里奥兰纳斯》有深刻影响。不过,普鲁塔克笔下以母亲和罗马好公民双重身份三次出现在“家”和“敌营”两个空间的伏伦妮娅形象略显单薄,止于一种笼统的静态之美,而莎士比亚笔下以女人、母亲、国家政治的隐性操手三重身份六次显性在场、三次隐性在场的伏伦妮娅,展现出多维空间下的悖论之美,表现出一种理性、欲望、激情与活力交织下的女性动态之变与灵魂之美。莎士比亚从生活真实出发,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下通过对伏伦妮娅形象的重塑,反映女性在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生存现状。他围绕女性—身体—政治这一脉络,通过对伏伦妮娅的隐性政治参与与其家庭教育方式之间关系的想象与构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其家国同构的思想。

**关键词:**《希腊罗马名人传》;《科里奥兰纳斯》;伏伦妮娅;家庭伦理;政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2)03-0013-11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2.03.002

古罗马帝国时代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西方传记文学的开先河之作。这部传记对莎士比亚创作的三大罗马历史名剧《科里奥兰纳斯》《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有深刻影响。作为《科里奥兰纳斯》中同名主人公母亲形象的伏伦妮娅,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科里奥兰纳斯传”中,仅有三次短暂的出现;但在莎剧中却频频在场,次数多达九次,且分布在不同幕不同场次之中。那么,莎士比亚与普鲁塔克笔下的伏伦妮娅究竟有何异同?莎士比亚对该人物做了哪些改编?改编背后体现了莎士比亚怎样的艺术美学原则,又寄托着他对社会人生怎样的思考呢?本文在比较两位笔下伏伦妮娅形象的基础上,意欲探讨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形象改编与再塑造的美学意

**收稿日期:**2022-0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19ZDA294);河南大学创新团队项目“经典阐释与文学文化比较研究”(2019CXTD006)

**作者简介:**于艳平,女,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李伟昉(通讯作者),男,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河南省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义与思想价值。

## 一、普鲁塔克笔下的伏伦妮娅：温柔母亲与罗马好公民

普鲁塔克在“科里奥兰纳斯传”中，三次提及伏伦妮娅。伏伦妮娅第一次出场是在家中，这是传统观念下女人应有的活动领域。当时，市民大会的投票结果判决伏伦妮娅的儿子马歇斯有罪，并且决定对他实行永久放逐。马歇斯带着心灵的创伤回到家中向母亲和妻子致意，“这时她们嚎啕痛哭泪流满面”<sup>[1]418</sup>。伏伦妮娅和儿媳作为马歇斯的亲人同时出现，且二人的表现并无明显差异。普鲁塔克寥寥数笔，以粗线条勾勒出伏伦妮娅悲苦忧愁而又无可奈何的母亲形象。

伏伦妮娅的第二次出现也是在家中。当时，马歇斯已经投靠敌国，作为沃尔西人的军事指挥官对罗马发起进攻。整个城邦即将受到暴风雨的侵袭，掀起的巨浪要将他们淹没。罗马贵妇凡勒丽娅“突然之间出于直觉或是发自内心的情绪，也许是神明的感召而灵机一动，产生非常正确的权宜之计，使得她吩咐这些妇女，一起随着她前往马修斯的母亲弗伦妮娅的家里。”<sup>[1]429</sup>凡勒丽娅请求伏伦妮娅加入妇女使团，一同到马歇斯那里去求情。在此情形下，伏伦妮娅发表演说以表自己的报国之心，“为了罗马就是气绝在他的面前也心甘情愿”<sup>[1]430</sup>。第三次，伏伦妮娅出现在沃尔西人的营地，与儿子当面交涉。普鲁塔克对于双方交谈的内容、言辞方面的叙述对莎士比亚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在母子谈判这一情节上，莎士比亚基本上复制了普鲁塔克对历史的叙述。

在普鲁塔克笔下，伏伦妮娅三次出现在两个空间，两次在“家”中，一次在敌营。第一次，简要描述作为母亲的伏伦妮娅在得知儿子被放逐后的情感反应；第二次，描写身为罗马公民的伏伦妮娅受罗马贵妇凡勒丽娅之邀，在国家危难之际愿意为国效劳；第三次，呈现伏伦妮娅践行诺言，冒着生命危险与儿子在敌营谈判。虽然普鲁塔克的历史叙述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母亲的爱子之情，一个罗马贵妇的爱国之心，但是以母亲和罗马好公民双重身份而出现的伏伦妮娅的形象依然略显单薄，止于一种笼统的静态之美。普鲁塔克笔下的伏伦妮娅充其量是一个遵守古罗马传统道德的女性形象：对儿子疼爱有加的温柔母亲，对罗马忠心耿耿的好公民。她的情感反应、行为表现似乎是古罗马贵妇集体形象的缩影，是一幅静态的古典世界中的女性图景，缺乏鲜活有力、震撼人心的个性特征。当然，这也为后来的莎士比亚留下了驰骋想象、挥毫泼墨的艺术空间。

## 二、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母亲与国家政治的隐性操手

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以普鲁塔克的伏伦妮娅为原型，但已有质的不同。莎剧中，伏伦妮娅显性出场六次，隐性在场三次，总计“在场”九次。第一幕第一场，因饥荒而聚众闹事的市民们在谈话中首次提及伏伦妮娅。“我对你说，他所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虽然心肠仁厚的人愿意承认那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他只是要取悦于他的母亲……”<sup>[2]314</sup>莎士比亚在这里借知情市民之口，透露出主人公马歇斯对母亲伏伦妮娅的特殊依赖关系。这一关键信息不仅巧妙地侧面点出了伏伦妮娅的不简单，而且为剧情做了极为重要的铺垫。

第一幕第三场，伏伦妮娅与儿媳维吉利娅一起出现在家中。这一场景主要交代两件事：一是借婆婆谈话交代伏伦妮娅育子理念及马歇斯的成长背景；二是罗马贵妇凡勒丽娅到访。伏伦妮娅首次亮相就表现出女性身上罕见的男子气概与尚武精神，与普鲁塔克笔下软弱的母亲形象大相径庭。在马歇斯尚小之时，她便鼓励儿子为荣誉而战。她说，如果我有十二个儿子，“我也宁愿十一个儿子为了他们的国家而光荣地战死”。<sup>[2]324</sup>女性主义研究者库恩认为：“在西方文化的战争叙事中，女性通常在家里，男性出去打仗是为了保护女性，女性天生的需要依赖男性的保护，而男性天生的就是好战和勇敢

的。”<sup>[3]55</sup>然而,作为寡母的伏伦妮娅却表现出对古罗马男性英勇美德的高度认可,以及对战场、荣誉和权力的向往。这正是古罗马社会传统荣誉观、权力观对其刻骨铭心的影响的外在表征。伏伦妮娅自觉遵循这一主流价值观,将儿子培养成骁勇善战的出色将士。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表面上是在写伏伦妮娅,实际上则是从侧面进一步交代马歇斯的家庭生长环境,为第一幕第四场中马歇斯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埋下伏笔,使得戏剧各场次之间互为因果,环环相扣。同时,婆媳二人面对马歇斯战场上可能的流血牺牲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认识。维吉利娅愁容满面,在尚未得到丈夫确切消息之前,宁愿足不出户,而伏伦妮娅却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不如出去放松心情。对于马歇斯可能的流血负伤,维吉利娅提血色变,而伏伦妮娅却认为“血更可以显出他的雄姿,远胜于为他的墓冢饰金”<sup>[2]324</sup>。婆媳对话中呈现了伏伦妮娅这一个性鲜明的受古罗马传统文化影响之深的上层妇女形象。

凡勒丽娅到访的情节,特别是她对小马歇斯捉蝴蝶场景的描述,正如肯尼斯·缪尔所指出的那样,出自莎士比亚的发明,“目的是对主人公的不成熟予以间接暗示”<sup>[4]</sup>。这些似乎是在讲述小马歇斯的故事,实则是对马歇斯幼年生活的写照。伏伦妮娅一语中的,“他(小马歇斯)宁愿看刀剑听鼓声,也不愿见教书先生的面。”<sup>[2]325</sup>小马歇斯性格中的坚韧或固执以及教育的缺乏正是父亲马歇斯的性格特点在儿子身上的投射,小马歇斯是父亲的缩影,承载着父亲身上的光环与瑕疵。此外,小马歇斯性格中的弱点也预示着马歇斯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后来由战神和国家的功臣沦为人民公敌的悲剧性原因。

伏伦妮娅第二次出现于第二幕第一场的罗马广场。这是普鲁塔克传记中没有的场景。中心事件是伏伦妮娅和维吉利娅、凡勒丽娅在广场欢迎凯旋的马歇斯,并借两场重要谈话,从不同侧面对伏伦妮娅形象进一步精雕细刻。伏伦妮娅与罗马元老米尼涅斯的对话,显示了她的政治见识;而与马歇斯的对话,则表明她借助规划儿子未来前途介入罗马政治生活的欲望。在第一场对话中,伏伦妮娅在关于创伤与荣誉问题的见解上与米尼涅斯一致,说明她深谙男性政治生活理路。米尼涅斯提到,“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总是负着伤的”<sup>[2]342</sup>;维吉利娅出于对丈夫的担心,立刻说:“不,没有负伤。”而伏伦妮娅却说:“他受伤了,感谢天神!”<sup>[2]342</sup>学界多有学者据此认为伏伦妮娅对待儿子冷酷无情,把荣誉看得高于儿子的生命。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长期以来,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古罗马战事频仍,将士负伤在所难免。于是,伤口成了荣誉的标志。正如米尼涅斯所言,“受了伤才更可以显得他的英雄本色,他有更多骄傲的理由”<sup>[2]342-343</sup>。伏伦妮娅渴望儿子负伤而归,不是因为不在乎儿子的生死,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而是因为她坚信儿子所向披靡的勇气。“凡是他所到之处,总是震响着雷声;他经过以后,只留下一片汪洋的泪海。在他壮健的腕臂里躲藏着幽冥的死神,只要他一挥手,敌人们就丧失了生命。”<sup>[2]344</sup>她对战场上儿子行为的想象和预判与米尼涅斯描述的情形完全吻合。在米尼涅斯看来,马歇斯“正像水草当着一艘疾驶的帆船一样,他的剑光挥处,人们不是降服就是死亡,谁要是碰着他的锋刃,再也没有活命的希望……”<sup>[2]350</sup>战争是古罗马社会生活重要的构成部分,伏伦妮娅对战场形势的精准预判,对儿子负伤而归的渴望,表明她深谙罗马传统文化的精髓。

而与儿子的对话,又表明伏伦妮娅是按照古罗马社会成功的标准来塑造儿子的。得知儿子获得“科里奥兰纳斯”的荣称时,她说:“我已经活到今天,看见我的愿望一一实现,我的幻想构成的美梦成为事实;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还没有满足,可是我相信我们的罗马一定会把它加在你的身上的。”<sup>[2]345</sup>这表明伏伦妮娅并不满足于儿子军事生涯的巅峰,而是希望儿子竞选执政,从军界转向政界,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获取更大的殊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场戏中,伏伦妮娅由“家”移步到古罗马政治、文化、宗教中心的“广场”,和罗马元老一同谈论创伤与荣誉的关系,并对儿子未来发展出谋划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莎翁笔下的伏伦妮娅是关心公共领域生活的心怀政治欲望的女性。她对创伤与荣誉关系之认识与古罗马社会主流价值观完全吻合。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家庭、家族的荣誉,捍卫家庭共同体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罗马贵妇,她能够高瞻远瞩,敢于充当儿子人生的规划师。这不仅是古罗

马社会所公认的实现家庭共同体利益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个体生命意义的基本路径。

伏伦妮娅第三次出场,是在第三幕第二场的“家”中。此时的科里奥兰纳斯已经被护民官宣判为“一个企图政变的叛徒”,面临被处死的危险。该场戏的核心事件是伏伦妮娅劝说儿子接受公民大会的审判,以和平、合法的方式化解当前危机,弥缝过去的错误,从而消弭与人民的矛盾。她提醒儿子不仅要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人民,而且要像米尼涅斯建议的那样——向民众屈身。她告诫儿子要减少逆意的事情,就不要再有意显露锋芒,向人民矜夸;比刚强的心更重要的是“头脑”,要把愤怒“用在更适当的地方”<sup>[2]374</sup>。她强调,一个人在危急时刻应当通权达变,能够使荣誉与权谋交相为用。她认为温和的言语方式不仅对荣誉毫无妨碍,而且可以避免把自己的命运孤注一掷;要维持荣誉和地位,就必须博取人民的欢心与爱护。她甚至亲自像儿子示范在人民面前怎么说、说什么。“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意思说话,却要去向他们说一些和你的本心完全不符的话。”“你可以对他们说,你是他们的战士,因为生长在干戈扰攘之中,不懂得博取他们好感所应有的礼节;可是从此以后,当你握权在位的日子,你一定会为他们鞠躬尽瘁。”<sup>[2]375-376</sup>

然而,久在沙场的科里奥兰纳斯无法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坚持认为说违心话有辱自己的高贵。当看到儿子还是如此倔强不改初衷,她便使出最后的杀手锏:“那么随你的便。我向你请求,比之你向他们请求,对于我是一个更大的耻辱。一切都归于毁灭吧!”<sup>[2]377</sup>看到母亲愠怒,科里奥兰纳斯最终妥协,答应前往市场,以温和而不失自尊的方式去面对人民的质问。伏伦妮娅对战争时期与平时时期荣誉与权谋交相为用的观点,表明她是一个深谙政治生活真谛、不乏政治智慧的女性。她使出浑身解数,尝试用多种方式,晓之于理、动之以情甚至是威胁的方式,确保儿子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智慧的母亲、识时务的豪杰之士。

伏伦妮娅第四次出现在第四幕第一场的罗马城门前。该场戏的中心事件是马歇斯与亲友告别。普鲁塔克只谈到马歇斯被判驱逐出境后,回到家中与母亲、妻子告别,而莎士比亚将告别的地点设在罗马城门前,参与告别的人除了伏伦妮娅和维吉利娅外,还有米尼涅斯、考密涅斯及罗马青年贵族。告别仪式的场面更加宏大,悲剧色彩更为浓厚。迈出罗马城,昔日的罗马功臣与英雄便是人民的公敌。儿子临行前,一向坚强的伏伦妮娅哭泣了,流泪了,但情感并没有让她忘记理性,她叮嘱儿子:“不要盲冲瞎撞,去试探前途的危险。”<sup>[2]384</sup>

伏伦妮娅第五次出现在第四幕第二场罗马城门附近的街道上。此场戏主要描写伏伦妮娅咒骂护民官,表达儿子遭放逐的悲愤之情。她因儿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诅咒护民官“愿神明把所有的灾祸降在你们身上”<sup>[2]385</sup>,痛骂他们为“杂种私生子”,但她决不允许自己在公共场合“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sup>[2]387</sup>。值得注意的是,伏伦妮娅在护民官面前的表现与第四幕第一场与儿子送别时的表现有所不同。在送别一幕中,一向用格言激励儿子坚锐志气的母亲反而需要儿子的安慰。然而,面对护民官,母亲收起了眼泪,表现出天后般的尊严。在她的影响下,一向静默的维吉利娅也敢于向护民官发出“你也别走”的挑战,甚至西西涅斯都怀疑伏伦妮娅和维吉利娅变成了男子汉。可见,伏伦妮娅对场域有清晰的认识,能够把控自己不同场合的言行。显然,这是一个积极应变、通权达变的了不起的女性。

伏伦妮娅第六次出场,则是在第五幕第三场的科里奥兰纳斯营帐。不同于普鲁塔克的历史叙述,莎士比亚仅以旁白的方式简洁交代事情原委后,将更多的笔墨集中在母子谈话、家庭伦理关系上,尤其是详细再现了伏伦妮娅说服儿子缔结和平协议的过程与方式。首先,她向儿子下跪,用有悖于罗马传统礼仪的方式,引起儿子对自己即将提出的请求的高度重视。接着,她阐述家国的关系,从家庭伦理谈到国家政治,从小家谈到大家。最后,她以死相逼,迫使儿子降服。伏伦妮娅对儿子性格了如指掌,懂得与他进行有效沟通的方式。她深明大义,在罗马危在旦夕之际,放弃私人恩怨,以国家代表的身份,不畏艰险,奔赴敌营,与儿子谈判。这表明伏伦妮娅具有大格局、大情怀、大生命观。为了国家,她可以忘记罗马曾经对儿子的不公;为了民族,她可以放弃与护民官的前嫌,表现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

豪情壮志。此时,她已超越了社会对女性的一切藩篱,跨界跻身于罗马政坛,成为关键时刻罗马命运的掌舵人。是她,挽救了罗马;也是她,一定程度上把儿子推向了命运的深渊。这种舍家卫国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莎士比亚对女性品格无意识的讴歌与赞美。

第五幕第四场,借米尼涅斯之口,“这位伏伦妮娅抵得过全城的执政、元老和贵族”<sup>[2]418-419</sup>,莎士比亚实现了伏伦妮娅不在场的在场。第五幕第五场描写罗马市民欢迎妇女团一行回国的热烈场面,而伏伦妮娅作为罗马的有功之臣而广受颂扬,最终实现了自身对荣誉的追求。

纵观全剧,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的六次显性出场与三次隐性在场均做出了细密精巧的安排。与普鲁塔克相比,莎剧中的伏伦妮娅形象更为立体,更具动态流变之美。每当儿子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她都会充当他的人生灯塔,为他照亮前行的路。她鼓励他冒险,去战场上英勇杀敌以博取荣誉;在儿子成为英雄后,她和其他元老贵族的劝说最终激起儿子竞选执政的欲望;当儿子面临公民大会的审判、生命受到威胁时,伏伦妮娅甚至告诉他如何行事,以保全性命与荣誉;当国家有难时,她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敌营,凭借英勇精神和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儿子,化干戈为玉帛。应该说,伏伦妮娅深刻地影响着儿子的命运走向。这个看似无情却有情的母亲,这个在国家危难之时勇于伸出援手的妇女,最终以儿子的牺牲捍卫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罗马面临的威胁解除了,她却永远失去了令她骄傲的儿子,失去了她一切政治欲望的承载者。如此颇具颠覆性的、深谙政治、不乏智慧和充满家国情怀的女性形象,又究竟体现出莎士比亚怎样的美学原则呢?

### 三、多维空间下的悖论之美

与普鲁塔克作品相比,莎士比亚的伏伦妮娅书写呈现出以下几个审美特征。第一,人物形象在多维空间中的塑造更为饱满立体。有学者将“空间表征法”作为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即“让读者把某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与一种特定的‘空间意象’结合起来,从而对之产生一种具象的、实体般的、风雨不蚀的记忆”<sup>[5]</sup>。国内外诸多文学批评实践也表明空间不仅是人物性格生成的具体场域,而且是人物形象的绝佳表征。莎剧中,伏伦妮娅的活动空间除了家,还有广场、罗马街道、罗马城门前、沃尔西人的军营等。随着人物活动空间的变化,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不断呈现出来。作为人类“最初的宇宙”,家属于封闭性的内部空间,是个人安全的港湾,也是个人自由释放个性的地方。因而在家庭领域内,伏伦妮娅既会眉飞色舞向儿媳谈论自己的育儿经验,也会因儿子遭遇放逐而潸然泪下。相反,家以外的场所均属于不同程度的开放的外部空间,是个人与他者互动从而彰显个人社会性的公共空间。一旦步入公共领域,伏伦妮娅就会收拾起心底的悲伤,除了对陷害儿子的护民官报以愤怒的咆哮外,她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天后般的尊严。显然,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是个内心情感丰富的多面女人,人生得意之时会夸夸其谈,失意之时也会黯然神伤。她也是个通权达变的女人,战争时期教导儿子英勇抗敌,和平时期教导儿子在人民面前和蔼谦恭;当儿子被放逐时,引导儿子不要试探未知的风险。国泰民安时,她鼓励儿子将个人仕途发展放在第一位;战乱时,她提醒儿子将维护国家安全视为公民的首要责任。

第二,在多元对话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面相。伏伦妮娅与之对话的人物不仅局限于儿子、儿媳,还有古罗马执政米尼涅斯和贵妇凡勒丽娅,以及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喉舌护民官。面对恪守妇道的儿媳,她在夸夸之词中表达自己宽博的胸襟和远大的理想;面对德高望重的米尼涅斯,她稳重大方,措辞严谨;面对凡勒丽娅,她有时轻松,有时严肃。面对歪曲事实的护民官,她毫无畏惧,破口大骂。她兼具“欲望”“理性”与“激情”,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言的具有完备灵魂之人<sup>[6]</sup>。

第三,在此起彼伏的伦理冲突中塑造伏伦妮娅“三位一体式”的女性形象,于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中表现人物的行为特征,并在人物一次次艰难的伦理选择中暗含发人深省的道德教诲价值。纵观全剧,伏伦妮娅的伦理选择过程也是伦理悖论外溢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伏伦妮娅自身的伦理价值观充满悖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认为“自然意志”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表现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心理动态;“理性意志”则是人性因子的意志体现,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表现形式<sup>[7]12</sup>。个体的每一次内心挣扎与选择都是自然意志和理性意志博弈的过程。从家庭伦理角度来看,身为寡母的伏伦妮娅对儿子的爱潜藏着政治理性与自然亲情间的伦理冲突。莎士比亚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将失去丈夫的伏伦妮娅从伦理的从属地位提升至伦理的主导地位,让她在儿子的每个人生十字路口都面临着艰难的伦理选择。基于古罗马家庭生活中的等级制伦理模式,父亲在家庭中拥有最高的权威,是家庭事务和利益的最高决策者,妻子和儿女都有服从夫权、父权意志和维护家庭利益的义务。父亲去世后,母亲代替父亲成为家庭事务的决策者,母亲的意志转而成为家庭的意志。伏伦妮娅对儿子的爱处处彰显伦理冲突。虽然她像其他母亲一样,因血缘关系与儿子存有天然的舐犊之情,然而,她又不是一位普通的处于伦理附属地位的母亲,她因丈夫的去世而被“推到”家庭伦理的主阵地,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总导演。尽管兽性因子的存在使得她和儿子之间感情深厚,但她还是选择让未成年的儿子接受战争的洗礼。与关心马歇斯生命安全的儿媳不同,伏伦妮娅似乎更关切儿子能否获取新的功名和荣誉。“在她看来,儿子的价值不在于其自然肉体的存在,而在于其政治理性意义上的存在。”<sup>[8]</sup>可见,在教育儿子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伏伦妮娅的理性意志。她欲按照古罗马传统的教育观念将儿子培养成人人敬佩的勇士。当马歇斯面临事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是继续英雄神话,还是角逐政治权力——她不顾儿子孤傲不宜从政的性格,再次出于理性意志对政治声誉的博取,暗示儿子参与执政竞选。伏伦妮娅视儿子政治功名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儿子自身的存在。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作为母亲的伏伦妮娅曾因罗马放逐自己的儿子而与国家结下伦理结,对国家心生怨恨。这一点从她对护民官的诅咒可见一斑。然而,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伏伦妮娅主动前置自己作为罗马上层社会公民的伦理身份,果断选择打开心结,与国家和解,自愿充当罗马的和平使者,为国排忧解难。在与儿子协商时,她不停地倾诉马歇斯的投敌行为为己为家为国造成的伦理身份的悖论之苦,以此唤起马歇斯对罗马公民身份的记忆。除此之外,她再三强调个人荣誉与公民身份间的关系,即置公民身份于不顾的所谓荣誉都只会换来永远伴着唾骂的恶名。可见,无论在家庭的规划与发展,还是在国家的生存与保护方面,伏伦妮娅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性与自然亲情在交织碰撞中相互较量、一比高下,而她的伦理选择也体现出鲜明的伦理意识,即国泰民安之时,个人荣誉、家庭利益居于首位,而在国家危难之时,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其次,伏伦妮娅自身的伦理价值观与伦理场域形成悖论。家庭生活中,家庭伦理理应占主导地位。公共政治生活中,社会政治理性理应占上风。然而,伏伦妮娅的伦理价值观却与伦理场域总是发生错位。家庭决策时,如在儿子的教育方式及事业的选择方面,伏伦妮娅始终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理性;而在公共生活领域,她却使出家庭赋予其的伦理权威,用母子伦理的自然情感战胜儿子的社会理性,迫使儿子放弃自己的本性和尊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来顺从并实现其作为母亲的意志。她以伦理价值观与伦理场域间的悖论唤醒儿子家与国的唇齿关系,警醒儿子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只有在属国范围内才能为人称道。与国为敌,只能名誉扫地,而且会给予孙后代带来耻辱。只有为国奉献,方可青史留名,换取一世的荣誉和永久的英明。当国家有难之时,伏伦妮娅主动将来自家庭的伦理权威转化为与儿子进行政治谈判的砝码,成功地融母亲意志、家庭意志和国家意志于一体。

最后,伏伦妮娅的伦理价值观与儿子的伦理价值观形成悖论。如果说个体是一个伦理存在,那么母子二人伦理存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都外化为对名誉的追求。然而,二人的荣誉伦理观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马歇斯秉持的伦理价值观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认为个体的尊严、骨气和名誉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社稷安危,而母亲坚守的是传统的古罗马国家主义,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儿子的生命安危。于是,因血缘纽带而建立起深厚情感的母子在伦理价值内质上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政治伦理冲突,而这种政治伦理冲突又以传统家庭伦理赋予母亲的家长制权威和独特的权力,并以

母亲有违传统伦理礼仪的向儿子下跪的方式得以调和。有着政治高度的伏伦妮娅以母亲的身份和以死相逼的方式调和了与儿子的矛盾,走出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彼此交织的伦理困境。只是,政治伦理困境的走出,意味着家庭伦理伴随而来的失子之痛。

伏伦妮娅在不同空间的不同表现,在不同交流对象中的不同言说方式,在不同政治局势下对儿子伦理价值观的不同引导,充分表明这是一个见多识广、深明大义、爱恨分明、顾全大局有着大生命观的女性。她是一个有悖于罗马传统的女性,是一个敢于进行跨界挑战的女性,又是一个有着多重矛盾的综合体。作为罗马上层妇女的一员,她不满于做一个男性意识规定下的具有良好妇德的普通女子。她有一颗男人的心,对荣誉和权力充满渴望;作为母亲,她不满于对儿子的规训,心怀通过儿子介入政治生活的欲望,拥有挑战从家庭领域到政治领域跨界的勇气。她属于波罗梅伊所言的那种“拥有贵族式的权力偏好,热衷于贵族精神的展现,还具有实用主义精神”<sup>[9]</sup>的罗马共和国上层社会妇女参与政治的典型代表,能在军队和政府两个领域都发挥重要的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价值是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价值,而审美价值是伦理价值的一种体现。换言之,审美是“实现文学教诲功能的一种形式和媒介,是服务于文学的伦理价值和体现其伦理价值的途径和方法”<sup>[7]9</sup>。莎士比亚在多维空间、多元对话与伦理悖论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伏伦妮娅在一次次伦理选择中所特有的情感、思维及行为方式上的动态图景,实现了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的有机融合。

#### 四、伏伦妮娅形象的丰厚意蕴

莎士比亚在三十七部剧作中塑造了百余个女性形象,她们身处社会各个阶层,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时间跨越从古代到他所处的时代,地域范围从英国延伸至法国、埃及、罗马等国。他描写的女性类型丰富,有少妇、妻子和母亲等。伏伦妮娅则是罗马已婚上层妇女的代表。国内有学者将莎士比亚的女性形象创作分为两个阶段,悲喜剧阶段和1600年以后的戏剧,且认为第一创作阶段中的女性都是正面形象,集中了人文主义者所崇尚的美德;而第二阶段,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从数量上来看,正面女性所占比例已大大减少,即使是所颂扬的女性,也不再是完美无瑕。<sup>[10]</sup>国外学者诺威尔(Novell)指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与反映父子关系的戏剧数量相比,反映母子关系的戏剧数量较为贫乏,但莎士比亚确实在故事中赋予母亲应有的地位。他将莎士比亚笔下的母亲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势母亲,另一种是弱势母亲。强势母亲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不会耐心等待事情顺其自然发展,而是积极推动事情的发展;其二,关注政治,享受权力,为权力工作,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而争斗;其三,缺乏对家庭成员的个人情感。弱势母亲则不喜欢争强好胜,至少在涉及他人的事情,特别是自己儿女的事情上,不喜欢干涉,也不喜欢复仇。<sup>[11]</sup>诺威尔认为伏伦妮娅具备强势母亲所具有的一切特征,而且是儿子马歇斯悲剧的总导演。参照国内外学者对莎士比亚剧作中女性形象的分类研究,可以认定伏伦妮娅是莎士比亚第二阶段塑造的母亲形象。但伏伦妮娅究竟是正面形象,还是负面形象?属于强势母亲,还是弱势母亲?在这位罗马贵妇身上,究竟寄托着莎士比亚怎样的人生思考,又体现出他什么样的女性观呢?

国内有学者指出,在进行莎剧创作来源研究时,应该考虑社会环境维度,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时期正处于格拉斯·布鲁斯特(Douglas Bruster)所言的“中世纪和现代英格兰之间的分水岭”,而这一时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冲突恰好为莎士比亚提供了大量的戏剧性创作素材”<sup>[12]</sup>。正是在多重社会矛盾的碰撞与冲突中,莎士比亚对人性的了解逐步深入,对社会的认识日渐深化,他的思想和艺术也日趋成熟,不过,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却也蒙上了一层阴霾。他笔下的伏伦妮娅不再是单一的正面或负面形象,而是有着多面相的复杂综合体,承载着莎士比亚对女性、身体、政治三者关系的深入思考。伏伦妮娅显然具有诺威尔所言的强势母亲的前两个特征,但她对儿子并非看上去的那般无情,更不是儿子命

运悲剧的罪魁祸首。她既不是史学家笔下伏伦妮娅的真实写照,也不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上层妇女现状的如实反映,但与两者紧密相关。事实上,莎士比亚是在融合古罗马历史事件和英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想象形塑着自己心中理想的上层妇女形象,并让人物为自己的思想代言。

福柯指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身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历史、限制或义务”。<sup>[13]</sup>伏伦妮娅的女性身份感及其文化意义都体现在其作为女性的身体上。有着显赫家族背景的她对政治生活表现出一定的关注与兴趣。但在父权制盛行的古罗马社会,女性的主要任务是操持家务,不被允许参与社会事务,更不可能活动于政治事务中。<sup>[3]58</sup>谢尔通也认为:如果妇女展示出独立的思考能力或者对家庭和家族外的事情表示关注,她将因此受到批评。<sup>[14]</sup>因此,伏伦妮娅只能借助身体通过助力儿子政治仕途发展这种不易为人察觉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参与政治、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在渴望与需求。莎士比亚将伏伦妮娅的政治参与行为聚焦于其政治欲望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伏伦妮娅主要借助以下身体策略来参与社会政治。第一,通过孕育、生育、养育男孩,让儿子成为家族荣誉的继承者,以及罗马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伏伦妮娅说:“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个男孩子的时候,还不及第一次看见他已经变成一个堂堂男子的时候那样欢喜得跳跃起来。”<sup>[2]323</sup>在她看来,儿子是其实现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桥梁。从个人层面来看,儿子是伏伦妮娅个体生命的延续;从家庭层面来看,儿子是丈夫家族香火的后继者,是伏伦妮娅在家庭或家族中获得尊严与地位的保障;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儿子不仅是其表达自身政治欲望与诉求的隐性介质,也是其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有效途径。第二,通过血液实现与儿子身体上的连接。伏伦妮娅对儿子说:“你是我的战士;你这雄伟的躯体上一部分是我的心血。”<sup>[2]413</sup>无论世事如何变换,血缘始终是捆绑母子的粘合剂。血缘关系的存在客观上确保伏伦妮娅在儿子面前的合法权威形象。“罗马母亲,特别是寡母,不仅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对成年子女也能施加很大的影响。”<sup>[15]</sup>古朗士也指出:古人认为家庭的美德是“虔敬”,对父母的孝敬,是一种虔敬;对子女的慈爱,也是一种“虔敬”<sup>[16]</sup>。换言之,血缘关系再加上伏伦妮娅有意识的规训与培养,已经确保儿子对母亲的绝对忠诚,马歇斯已经成为伏伦妮娅介入并影响国家政治的代言人,因为在马歇斯看来,母亲的身体就是塑成自己躯体的“模子”。第三,按照自己对身体灵魂的设计,对儿子事业发展予以规训。她首先培养儿子的冒险精神和在战场上的英勇精神。她明白英勇是古罗马男性最大的美德,英勇是获得公共荣誉的砝码,而荣誉是通向政界的通行证。第四,对儿子言传身教,关键时刻甚至亲力亲为。伏伦妮娅率领妇女使团前去敌营向儿子求情便是明证。莎士比亚通过一系列和身体有关的词汇,如“心血”“模子”“捆绑”等,将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这一特殊关系,也是伏伦妮娅实现个体政治诉求和生命意义的为数不多的有效途径之一。

女性观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和反映。由于地域、国家、民族、信仰、阶级、阶层等的不同,人们的女性观存在一定差异。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的形塑?莎士比亚在伏伦妮娅这一人物形象中寄托着怎样的女性观呢?

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形象的塑造过程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莎士比亚对罗马社会文化传统的认知,可能为其提供了伏伦妮娅性格的主色调。显然,他把伏伦妮娅放置在为罗马历史进程发挥积极作用的妇女行列。纵观罗马国家身份建构的历程,尽管充满传奇色彩的相关历史叙事集中在男性化的军事政治领域,但女性确实在罗马城的建设中发挥了作用。瑞亚·西尔维亚(Rhea Silvia)遭战神马尔斯的强奸,诞下罗穆路斯和瑞幕斯,罗马城才得以创建。被绑架到罗马的萨宾妇女在他们的男人之间成功斡旋,及时制止一场血腥屠杀,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罗马民族和萨宾民族的融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数量相对较少的罗马历史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全都是正面的,事实上也不乏像小图利娅(Tullia Minor)和塔皮亚(Tarpeia)这样的反面例子。可见,在罗马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形象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且时常交织在一起,很难说孰优孰劣孰多孰少。但可以确定的是,对女性的正面描绘通常以她们为罗马国家利益做出牺牲而告终,特别是卢克丽霞(Lucretia)和维吉尼亚(Verginia)的悲剧标



志着罗马社会政治格局的重大转折点。桑德拉·乔谢尔(Sandra Joshel)在她的里程碑式的文章《女性、身体和国家》中指出,在李维的罗马史中“被强奸、死亡或失踪的女性到处都是”<sup>[17]</sup>。由此得知,罗马妇女的社会地位将她们的政治角色限制在受害者行列。然而,传奇女性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传统做出贡献,即在宗教领域,妇女有可能在不成为牺牲品的情况下,为罗马人的身份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并加强国家的安全。普鲁塔克的《科里奥兰纳斯》中就曾提到类似情形:凡勒丽娅受到神灵启示,率领妇女去科里奥兰纳斯家中,请求其母加入妇女使团,前往沃尔西人的军营谈判。之后,又讲述了女性捐款修建行出资建立神庙等事宜。然而,莎士比亚没有提及凡勒丽娅受神灵启示,也没有提及凡勒丽娅专门去请求伏伦妮娅参加罗马妇女使团一事,因此也没有罗马妇女使团出行前伏伦妮娅与凡勒丽娅的长篇对话。相反,莎士比亚将普鲁塔克传记中凡勒丽娅与伏伦妮娅的对话内容转移到伏伦妮娅在沃尔西人的营帐中与儿子的对话中。此外,她向儿子求情的过程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她用感人肺腑的言语超越了男人们的武力和妇女们的眼泪,感化了她企图攻打罗马的铁石心肠的儿子,使他离开了罗马。”<sup>[18]</sup>她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使命,不但自己毫发未损,反而因此为自己获得崇高的荣誉。莎士比亚如此改写,可能是为了浓缩剧情,突出主线,加快戏剧叙事节奏。从主题角度讲,莎士比亚或许想凸显或放大伏伦妮娅自觉的爱国意识和家国情怀,以及她对儿子自始至终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或许在莎士比亚看来,不能因马歇斯遭沃尔西人杀害,就否定她育子的理念与方式。他或许在暗示:女性介入政治最简单最有效且最安全的方式是通过对子女的教育。马歇斯一人的选择事关两个国家的命运。正是得益于伏伦妮娅对儿子的教育与说服,马歇斯宁死也要达成母亲的心愿——为双方缔结和平。马歇斯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母亲做一件事。在此意义上,更能凸显伏伦妮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所持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一个了解子女内心诉求和性格的母亲,一个心怀祖国的母亲,总能够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这不仅折射出伏伦妮娅作为母亲的巨大人格魅力,也体现出其舍小家为国家的大局意识。

其次,英国早期现代男性作家有关女性的写作为莎士比亚书写伏伦妮娅的悖论形象提供了启示和思路。这一时期男性有关女性的写作按照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女性形象、地位和角色的综合探讨。该类写作以小册子为主,将女性想象定义为“尖酸刻薄、好争辩、爱抱怨”;认为正常的女性角色应为“贞洁、沉默和顺从”;认为妇女的身体,就像她们的社会地位一样,要服从于他人的意志。第二类是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写作。该类写作以日记、信件和好妈妈指南为主。认为孩子应该对父母唯命是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很复杂,但父母可以使用身体上的强迫来让孩子服从。第三类是具有讽刺性的对女性赞扬的作品,诸如《对女性的赞美》等,其中托马斯·埃利翁(Thomas Elyot)的《为女性辩护》认为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理性。此类写作认为对所谓女巫的迫害也表明对女性超出规定的社会角色的不安。尽管女性通常是逆来顺受的,并常常被限制在家里,但在想象的范围内,她们显然不太容易受到控制。<sup>[19]</sup>上述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莎士比亚为何在《科里奥兰纳斯》中围绕伏伦妮娅和马歇斯的关系大做文章,并以二人关系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主线之一。

最后,莎士比亚对伏伦妮娅的文学想象与当时英国社会流行的妇女观并不一致,却与英国政治生活的现实多有暗合。在《亨利六世》中,护国公格洛斯特表达了对试图参与贵族们讨论的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的厌恶:“用不着女流之辈来掺和此事”。<sup>[20]</sup>显然,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女人是不能参与政治的,她们被希望是“不存在的”<sup>[21]</sup>。但是,莎士比亚在该剧中所表达的思想与此并不一致,因为格洛斯特很快遭到了玛格丽特的惩罚,为其大胆放肆之词付出代价。时隔约十五年后,莎士比亚在《科里奥兰纳斯》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互矛盾,彼此对立。正如卡罗·汉森(Carol Hansen)所言:“极度的反讽”是“有着女人身份的伊丽莎白一世,正在整个舞台上奔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整个国家奔跑”。<sup>[22]</sup>莎士比亚选择有意背离主流思想,却又迎合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政坛叱咤风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现

实。莎士比亚以此暗示他对女王领导的英国社会所取得的各方面进步予以赞同,同时也表达出对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社会现状的不满,表达对女性不适合参政的传统观念的质疑。

## 五、结 语

与普鲁塔克相比,莎士比亚给予伏伦妮娅充足的文本空间,对其形象进行大刀阔斧的拓展和细致入微的雕琢。这既体现出他在戏剧美学上的创意,又反映出其对以伏伦妮娅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已婚妇女人生角色的独特认知。有学者指出:“对空间与人物性格关系的洞悉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标志之一”。<sup>[23]</sup>在此意义上,莎士比亚无疑属于具有创造性的剧作家。他通过延伸伏伦妮娅的活动空间,让她的足迹涉及罗马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并在两个领域的变换中呈现其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间的对立与互补。同时,伏伦妮娅与之对话交流的对象也非囿于家庭成员,而是拓展到罗马政界要人和上层妇女。此外,伏伦妮娅与他人交流的话题范围甚广,涵盖育儿理念、战争创伤与荣誉的关系、个体生命价值与国家命运间的关系等,这充分表明她绝非安于妇道的平凡女子。在更迭的活动领域、变换的话语对象和广泛的交流话题中,贯穿始终的是她对罗马精神的弘扬,对政治参与的关注与兴趣,对家与国的热爱与守护。莎士比亚在多维空间的转换中,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伏伦妮娅女人、母亲、国家政治的隐性操手之三重身份,在矛盾冲突、唇枪舌战中展现一个共和国早期上层妇女的生存环境。在传统妇女美德与个体生命追求、内心欲望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中,伏伦妮娅凭借自己的女人身体和女性智慧,试图挑战从家庭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越界。虽然很难说,这种越界是否真的成功,但至少在此过程中,读者或观众可以意识到女性潜在的参与政治的机会、能力与智慧。伏伦妮娅的“越界”行为虽然可能会让莎士比亚时代的男性观众感到不安或敌视,但对当时的女性观众,特别是拥有超越性别才智的卓越女性读者或观众而言一定不无激励,即使对于处于现代社会的女性而言也不无启迪。伏伦妮娅对儿子和家庭表现出的爱意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所认可的人类基本情感之一,她对罗马共和国表现出的忠诚与奉献精神是每个国家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虽然《科里奥兰纳斯》对以伏伦妮娅为代表的罗马上层妇女在政治领域所表现出的智慧与力量予以某种程度上的承认,但又需牢记古罗马上层妇女的政治参与仍然从属于第二性。莎士比亚只是从生活真实出发,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中反映社会女性在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生存现状。应该说,伏伦妮娅的政治欲望来自莎士比亚天才的想象,她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源于莎士比亚对理想家庭教育的想象。莎士比亚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彰显了他的家国同构思想。

艾略特曾经指出,《科里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艺术上最为成功的作品。”<sup>[24]</sup>从某种程度上看,诚哉斯言!

### 参考文献:

- [1] 普鲁塔克. 马修斯·科瑞欧拉努斯[M]//席代岳. 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册.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 [2] 莎士比亚. 科里奥兰纳斯[M]//朱生豪. 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6.
- [3] 宋海萍. 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对抗:生物—文化批评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剧[D]. 重庆:西南大学, 2013.
- [4] MUIR K. Source of Shakespeare's Play[M]. London: Methuen&Co Ltd, 1977: 247.
- [5] 龙迪勇. 空间叙事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 2014: 261-262.
- [6] 柏拉图. 理想国[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153-155.
- [7] 聂珍钊. 总序(一)[M]//聂珍钊,王松林.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8] 庄新红. 莎士比亚戏剧的伦理思想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12: 157.
- [9] POMEROY S B.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Inc., 1995:149.
- [10]李鸿泉.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J]. 外国文学研究, 1984(1):32-36.
- [11]NOVELL B J G. "O Mother, Mother: What Have You Done?": Shakespeare's Mothers in Relation to Catastrophe[D].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82:219-223.
- [12]黄力平,李伟昉. 莎剧来源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以传奇剧为例[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83-89.
- [13]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3:155.
- [14]SHELTON J A. As the Romans Did: A Source Book in Roman Social History[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259.
- [15]付静. 古罗马妇女美德:男性意识形态和妇女的应对[D]. 上海:复旦大学, 2009:86.
- [16]菲斯泰尔·德·古朗士. 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第2版[M]. 吴晓群,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126.
- [17]BURNS K. Constructing a New Woman for the Body Politic: The Creation of Claudia Quinta[J]. Helios, 2017(1):81-98.
- [18]奥维德. 爱经[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100.
- [19]马尔科姆·希伯伦.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核心概念[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6:119-122.
- [20]莎士比亚. 亨利六世[M]//方平. 新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181.
- [21]胡鹏.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外籍女性[J].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 2018(1):89-96.
- [22]HANSEN C. Woman as Individual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A Defiance of the Masculine Code[M]. New York:Peter Language, 1993:4.
- [23]龙迪勇. 叙事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J]. 江海学刊, 2011(1):204-215.
- [24]托·斯·艾略特. 哈姆雷特[M]//托·斯·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 卞之琳,李赋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79.

## Female, Body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Rome: Centering on Volumnia in *Coriolanus* by Shakespeare

YU Yanping<sup>1</sup>, LI Weifang<sup>2</sup>

(1. Center for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Center for Shakespea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by Plutarc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hakespeare's Roman historical play *Coriolanus*. However, Plutarch's Volumnia with the double identity of a mother and a good citizen, appearing three times either in "home" or "the enemy's camp", tends to manifest a general static beauty. By contrast, Shakespeare's Volumnia in *Coriolanus* with the tri-identity, namely a woman, a mother and an invisible national political manipulator, appearing nine times with six times in dominant presence and three times in absent presence, presents a paradoxical beauty in multi-dimensional space with her dyna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beauty of soul interwoven with rationality, desire, passion and vitality. Starting from the reality of life, Shakespeare refashioned the image of Volumnia within the broa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surroundings typical of his times and reflected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women in the domestic and political fields.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mnia's implici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her way of family education, Shakespeare organically associated family ethics with national politics to highlight his idea of the 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country.

**Key words:**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Coriolanus*; Volumnia; family ethics; politics



(责任编辑 杨文欢)